

宋霖著

李大钊

家族史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大钊家族史研究 / 宋霖著. —合肥: 安徽省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12-02734-0

I .李… II .宋… III .李大钊 (1889 ~ 1927) — 家史 — 文集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8321 号

责任编辑: 贾兴权

装帧设计: 姜海忠

李大钊家族史研究

宋霖 著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

发 行 部: 0551-2833066 0551-2833099 (传真)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 960mm 16 开 印张: 22.0 插页: 0.5 印张 字数: 290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2-02734-0/K · 565

定 价: (精) 40.00 元 (平) 35.00 元

印 数: 00001-03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李大钊家族史研究”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承担人宋霖。2001年立项。

—

项目的学术定位和学术追求是——经钩沉索隐的努力，遵求实存真的原则，客观真实地记录李大钊一家三代人的百年历史。并且，以此观照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进而从这一视角反观刚刚过往的百年中国。

项目的历史基础是——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妻子赵纫兰以其对革命作出的贡献，于1936年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五个子女在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才6个月，还在襁褓之中。兄弟姐妹五人在异常艰险的斗争环境里和极端困苦的生活境遇中长大，无一人沉沦或者退缩，都坚定不移地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先后投身革命，并且都在战争年代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两代人前仆后继的精神和事迹，谱写了一曲壮歌。长子李葆华1925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历

任重要职务,斗争经历曲折丰富,勋业卓著,革命生涯长达 80 年;他的妻子田映萱在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抗日斗争,1938 年入党,是华北敌后著名的“抗日三姐妹”中的二田,1940 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在延安和李葆华结婚,两人艰危相携走过一生,她在工作上也是业绩斐然。长女李星华在父亲牺牲和母亲病逝后,担负起了培育弟妹的重担,1932 年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北平入党,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非常英勇,1940 年去延安,建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和民间文学研究工作,卓有建树;她的丈夫贾芝出生于晋商世家,1936 年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期间参加革命,1938 年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并在那里入党,后进入鲁艺,建国后成为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次女李炎华是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中的闯将,在 1935 年一二九运动后入党,参加了 1938 年冀东抗日大暴动,暴动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经历坎坷,1945 年在冀东恢复工作。次子李光华 1940 年随姐姐星华奔赴延安,1941 年在延安入党,后在米脂县委工作,建国后在基层、大型企业、中国科学院工作,是一个忠诚勤勉的党务工作者;他的妻子李永兰是 1948 年入党的党员。幼子李欣华 1947 年进入解放区,1948 年在晋察冀边区入党,建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都珍惜革命家庭的声誉,格外严格地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勤奋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事业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生。在第三代中,也已经涌现出了多个业绩卓著的优秀共产党员。由李大钊树立的忠于信仰、严守节操、清正勤谨的家风得到了赓续。

项目的思想内涵和力求体现的价值是——李大钊一家人的革命经历,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经历了 20 世纪中国几乎全部重大历史事件,涉及的国共两党重要人物和各界代表人物数以百

计,其间的冲突激荡、兴衰荣辱、离合沉浮、乃至世态百相,汇成了一幅恢宏的历史长卷。李大钊一家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这足迹的纵横交错,构成了对广阔的社会生活面的覆盖,蕴藏了丰富的历史的与人文的内涵。——显然,一个家庭的百年史就能如此完整、典型、全面、深刻地反映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近百年历史进程,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自酝酿和创建以来近90年间走过的曲折道路,在中国现当代史和中共党史上都是罕见的。此项研究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就在其中了。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最终要完成的是《李大钊一家百年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二

李大钊研究是中外瞩目的一门显学。

建国以来,一大批老中青年学者倾注心力,辛勤耕耘,几十年来英才群出,著述宏丰,建树卓然,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外国如前苏联、日本和美国也有以李大钊研究为专攻的学者,学术成果亦堪称丰硕。

我走的是另一条路,研究他一家三代百年史。这项研究可以视为李大钊研究的拓展和外延。研究对象从一个人扩大成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十多个有研究价值的个人。在这里,李大钊除了各种重要的社会角色之外,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子、人夫、人父,是一个有着高尚道德和超卓品行的凡俗的人(鲁迅语),是子女们最早也是最好的人生导师。接下来,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李大钊的五个子女们,他们在李大钊的直接教育或间接影响下长大成人,都历经危难,继承了李大钊的精神和事业,每人都有一部丰富人生,其间许多史事具有动人心魄的史诗品质。

第三代中“延安娃”们已年近七旬,大多数为建国前后出生,人生经历主干部分从20世纪六十年代持续到21世纪初,经历了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到反腐倡廉,有数人具典型意义。

把这三代人的历史命运紧紧地结为一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显在的:是共同的政治信仰、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政治追求,还有对第二代和第三代人来说共同的家庭背景和由此产生的特定的后天成长环境,而非血统。我认同:人是社会的人,后天环境造就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为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由是,他的后代就必然地、无可回避地成长、生活、工作在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敌对方面所施加的影响且不说。在革命队伍中,他们必然地要承受社会关注、社会期待、乃至有监督意味的社会审视。这是一种强大而且持久的压力或曰推动力。他们必须以实际行动来作回应,要么自我约束、自尊自爱自强、严格律己、不断完善并升华自己,要么相反。

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家风传承下来了,而且这一传就是漫长的一百年。如同自然界里奔流千里穿越山区丘陵平原城镇之后仍能不改其清澈洁净的江河极为罕见一样,李大钊家风堪称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精神珍宝。这珍宝,经历过沧桑岁月的洗磨和时代大潮的淘漉,抵抗了浊流的侵蚀浸染,历久弥新,愈发光彩照人、熠熠生辉。

巨大的久远的生命力,来自普世的价值。就道德层面而言,在这里,新道德和旧道德的精华部分交溶融合了。许多嘉言懿行,使我们既可见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具有的崇高道德情操的具体体现,又可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辉。

在中国现当代史和中共党史上,象这样持续百年没有中断、三代人未曾远离时代中心的家族历史,是有作科学研究的价值

的。他们的历史命运,深刻感动并且强烈震撼着我,推动我对过往百年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作钩隐抉微、真相载录、客观审视和理性思考。这,就是我9年前萌生立项想法的最初的原由。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由是,我面对的是一大片等待开垦的沃土。尽管开辟和拓荒的工作困难重重,但是,对于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史学工作者来说,当面临着一个规模较大的项目时,发现有那么多的空白需填、疑义需释、谜团需解、讹误需正,还有四处散在的资料需集,有年事已高的历史当事人和知情者头脑中的珍贵记忆需作抢救性的记录留存,如此的挑战性和紧迫性,就足以激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了。

这是一件浩繁的工作。我自知才疏学浅,绌短汲深。惟有以勤补拙,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在探索过程中经常遭遇困境,但咬紧牙关克服困难之后,又多有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收获和欣喜。激励我最多的是王安石笔下的境界:“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1996年9月,李葆华手书“钩沉索隐,求实存真”赠我。我视此8个字为责任使命和学术追求。

三

我原非李大钊研究界中人,走上这条路,纯属偶然。

然而,今天回望来路,这偶然,其实早已经寄寓在必然之中了。

1970年1月,我离开军垦农场,回到家乡工作,不久开始以浓厚的兴趣学习钻研中共党史和军史。我的家乡安徽省天长县(今天长市),曾经在1946年至1960年的14年间为纪念新四军故副军长罗炳辉将军而改名为“炳辉县”。在我的工作单位县文

化馆管辖下,有一所建于五十年代的罗炳辉纪念馆,馆址是一座精致的古旧四合院,“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抢走陈列的枪炮等武器搞武斗,把馆破坏了。我去时仍可见门墙巍峨,却蒿草没膝,关闭几年了,展品散失几尽,资料和研究工作更谈不上。老同志说起来都唏嘘感慨。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全国掀起了研究、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潮。由于多种因素的天缘巧合,1978年3月,我承担了研究罗炳辉的任务。研究工作得到了我的领导崇钤、葛健、张文、陈再霖、许纯玉等同志的支持。

按照学术常规编年谱,检索为数甚少的传记资料,发现他49岁一生无法逐月排出,其中13年多资料全部空白。于是,我开列出130多个应当填补的空白和需要进一步查证的问题,从1979年10月到1980年8月,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路为主干线,到相关省市自治区作调查。

独自一人背着行囊连续奔波了11个月,行程一万多公里,都是乘车,少数徒步,特别注重对重要事件发生地和与传主相关遗址的实地考察与调查。访问了二三百人,手抄资料逾千万字,拍摄照片200余帧,作笔记日记数十万言。每到一地都是“三部曲”:一是访问老干部、老红军、当地老年居民(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宝贵,但往往被忽视);二是进档案馆、图书馆(查阅民办或国民党官办报纸、杂志,地方志)、革命纪念馆查资料;三是到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或历史遗址作实地考察与调查,根据在史料研究中发现的疑点,检验辨别其正误或真伪。(在后来多个人物研究,包含对李葆华的研究工作中,皆采用此方法。)

这是一次刻意自苦的学习磨砺和精神修炼的行旅。11个月两万里,一个穷书生,身无几文,胸有天下,完全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计得失,每天十几个小时玩命地工作,自己生产也自己享受着近乎神圣的崇高感。在今天看来,很有些自虐色彩,在当

时,却是从“文化大革命”十年暗夜里走出的满怀报国之志和创业激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探索中的困顿,经济上的困窘,还有极度的困乏,全都不在话下,咬紧牙关就是了。在东部、南部和西部中国,我走过了千山万水,走过了秋冬春夏,归来时衬衣全破如鱼网。匆匆穿行在通都大邑、市城镇、荒村野岭,寻觅在遗址遗迹文献资料间。四处采访、埋头阅档、实地考察和调查,白天奔走,夜间整理,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办完事立即赶往下一站,紧张得如同打仗一般。旧历年的除夕,抱病进抵福建长汀,在瞿秋白囚室外和他一起在严寒中“熬岁”。途中住招待所,住骡马大店大通铺,也住一捆稻草上搁条棉被的地铺。背着越积越重的资料(为省寄费,更为怕邮寄遗失),归来时仅两袋资料和抄录的几十本簿本就重160多斤,一路上还能背着提着奋勇赶路挤车,回到家再提起就艰于行走了。那是全国粮食紧缺、没有粮票就买不到饭吃的年代,每天靠四五碗清汤面果腹,总处于半饥饿状态中。省外出差一天补助两毛钱,清汤面三两粮票一碗的就得一毛一分,加上每天消耗两盒香烟,是不敢再奢侈的了。采访老干部必受款待,但总是矜持地只动少许。(自尊自爱是要以自苦为代价的。)那时复印机是稀罕物,只在上海图书馆见过,搜集资料全靠手抄,然后校核三遍以上。江西兴国黄健民见我抄得太苦,以两大册材料见赠,我至今感激于心。万里征程中,我做到了慎独,过九江不上庐山,到昆明不去滇池大观楼,一门心思工作工作工作,苦行僧一般。因此沿途留下了好名声。我的恩公欧远方院长就是在一次全国会议上听到关于我的传闻知道我的存在的。而向他说起我的温济泽,我并不认识,肯定也是听其他人说。套用我的朋友童志强的话来讲,11个月的学术实践大约抵得上读一期研修班。

在罗炳辉研究顺利进展、填补了大量空白、订正了一些讹误

的同时,对党史军史上的重要问题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如,发现并订正了《辞海》(1979年版)附红军长征路线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绘红军长征路线图的近3000华里的绘制错误,发现并订正了多种史著对中央红军4个军团之一的第九军团黔滇川省单独行军记述的错误。(此项研究成果后来得到了相关部门研究结果的完全证实。论文后来在《安徽史学》发表,多次获奖。在1991年纪念建党70周年全国党史学界科研成果评奖中,获安徽省党史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党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

至今令我深为抱憾的是,在第11个月进入云南后,因身体累垮,病倒异乡,全身疼痛,被迫半道返回,剩下的预计再用一个多月即可完成的由滇入川经西康和雪山草地进入甘肃经成县到会宁的较单纯的考察和体验任务,未能完成。

其后,调研工作又断续进行了两年,得到了滁县地区有关部门领导白振亚、韩枫、姬树明老师和挚友刘思祥的支持和帮助。

下笨功夫和苦功夫研究罗炳辉的经历,以及对历史取极其审慎的态度、不图虚名、自甘寂寞、严守职业道德、遵守纪律、绝不轻易公开发表文字的顽强的坚持和坚守,使我很快就获得了一大批党史学界的好师友。最好的师友是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童志强、南京大学马洪武、王德宝、陕西人民出版社郭洛夫、王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佳木、福建省委党校蒋伯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高三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吕芳文等人。特别令我永志不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胡华老师、彭明老师、戴知贤老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淇老师、中国人民警官大学陈志凌老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闫景堂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翟作君老师、人民教育出版社王剑英老师等人给予我的教诲、勉励和关怀。他们的真诚友谊、慷慨支持和给予我的厚爱,在使我在倍感

温暖的同时,也令我更加严谨刻苦、认真细密,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

一个中文系出身的人,由是进入了历史学界。

在马洪武教授的引荐下,从1981年起,我开始参加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后来又参加了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工作,直接在胡华教授、彭明教授、王淇教授、陈志凌教授的领导下工作,受到了他们的耳提面训、谆谆教诲、亲为示范和悉心指导,经常有追随先贤登高山以观沧海、眼界心胸顿觉开阔之感。审读、修改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传稿,是学习更是锻炼。胡华老师等前辈师长都是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我辈小子岂敢有半点散漫!每次参加全国审稿会,在极度疲劳的同时,都会觉得学业上有所长进,境界上有所提高。后来,我被聘为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后又特聘为副主编)。此期间,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欧远方、副院长徐则浩和唐锡强老师的关怀下,我于1984年调入历史研究所专门从事研究工作。挚友崔传义、安徽省委党史办副主任韩熙型给予了鼎力帮助。1991年,《中共党史人物传》1至50卷编竣。(收623人传记、共1270万字。先后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吴玉章奖金历史类一等奖。这套书的影响远及前苏联和美、日、英等国。)为祝贺前50卷的完成,《中国教育报》1991年8月18日发表长文《功德无量惠后人》介绍了这项中国中共党史学界空前规模的浩大工程,文中提及了我的罗炳辉研究工作。当年9月,我被评为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优秀组织、编辑工作者。

1993年,我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吕芳文受命合作承担研究胡耀邦的任务。我们都非常珍视这个项目,在拜访李昭和胡德平后,全力投入工作。不久,因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难得而不得不搁置下来,至今思之怅然。

就在此时,1994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批准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1—100卷编纂规划》,立传名单中有李葆华,李葆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安徽当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编委会指定我具体承担他的传记的研究与撰写任务。

——李大钊家族史研究,就是在李葆华研究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新项目。

这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

但是,我深知,如果不是在我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有那么多的领导、师长和挚友鼎力帮助的话,这“渠”根本就不可能有,我这一小滴“水”早已在沙地上耗干。这就是为什么我近年来常常说“感恩”二字的缘由。是的,我真诚地感恩。

四

1995年7月,在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安排和协调下,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组建的《李葆华》传记组在北京成立,任务是为《中共党史人物传》提供一篇小传《李葆华》,人总行办公厅副主任姜洋任组长(他不久调离),我任副组长和主笔,人总行杨永林任副组长,安徽方面刘思祥、萧志远和人总行张首军做协助工作。给予帮助的还有习向阳。

研究工作是严谨、严格和认真细密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也牺牲了很多。在1998年6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李力安在报告中表扬了《李葆华》传记组的工作。(他同时表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中原主持的张闻天研究、我主持的罗炳辉研究。)2000年8月,任务完成。《李葆华》(共4万字)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9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4月出版。2003年,《李葆华》获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三等奖。

2001年4月,在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楼永良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李葆华传》得以启动,已经酝酿了数年之久的“李大钊家族史研究”也随后立项。因为这两个项目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两个项目同时进行,首先集中力量做家族史研究。

五

在研究和学习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历史科学研究的真义?

我的理解是:发现未知,检验已知,复原全相,揭示本质,阐发规律,资治育人。其中,发现未知和检验已知是基础,是树之根系、山之土石、江河之源。

学术研究固然要有传承、有借鉴、也有对他人研究成果的直接征引,但,应当有严格的限度。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掘和新观点的发现,没有对成说中偏差和错误的匡正和廓清,只是承袭和转述,就谈不上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创新。靠东抄西摘别人公开发表的成果而敷衍成篇,是不良的行为。

我把这些认识贯彻到自己的研究工作当中,效法先贤司马迁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首先是下苦功夫搜求文献资料,记录口碑史料。(即所谓遍览“石室金匱之书”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在资料建设上以“穷尽”二字为追求。真正的“穷尽”是做不到的。但以此为追求的目标,就能激励自己竭尽全力、穷搜远讨。即使到山穷水尽确无路时也绝不轻言停止。

例如,建国后李葆华任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61年1月调离,时间长达12年,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利建设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空前辉煌的历史时期,也是李葆华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进入水利部档案处,面对卷帙浩繁

的档案,根本无从知道有用的材料在哪里,唯有用“穷尽”的方法将文书档案从卷宗第1号起一卷不漏地查阅。我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查阅了从1949年10月水利部建立到李葆华调离这12年间全部的文书档案(包含部务会议记录、党组会议记录)。考虑到他调离后还可能会有未尽事宜的后续处理,又延续查阅到1962年。有时候会连续工作几天无所收获,但我认为这是另一种收获——就是证明了那几天阅看的卷宗里没有我认为可用的材料——而“证无”和“证有”在学术上同样地重要。阅档的收获是丰厚的,发现了许多珍贵史料,其中包括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件7件。同时,还查阅了从创刊起到我去阅档时的全部《水利工作通讯》、《中国水利》、《水利与电力》、《水利电力技术》、《新黄河》、《黄河建设》、《人民黄河》、《人民长江》等刊物。档案处同志说,没见过像你这样干活的,这些档案从来没有人象你这样翻过。他们向我提供了许多支持和方便,我至今感激于心。

由于时格势禁,还有许多工作还没能去做,至少还应当到黄河水利委员会(郑州)、长江水利委员会(武汉)、淮河水利委员会(蚌埠)及相关大型水利工程去查阅档案、考察调查,把基础夯实。因为,历史科学研究靠材料说话,来不得半点虚浮。

六

还有表述方法的问题。

史学著作的表述不应该只有单一的风格存在,应视研究对象的不同和记述内容的不同而定。历史原本是活泼泼的,多姿多彩,没有理由用枯燥刻板八股腔的表述把它弄僵。应当追求表述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

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离骚》的文辞是很美的。孔子说:“言之无文,其行不远。”文,是

文采。《史记》被后世推崇,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司马迁史德高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忍垢发愤著书)、有良史之才(“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表述精妙、生动传神。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传记,或“雄而肆”,或“宏而壮”,或“核而详,婉而多风”,或“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明王世贞语),“籍人以明史,面目活现”(梁启超语),是后世学习的范本。

《史记》中人物传记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二以上。可以说,如果司马迁不是作出以纪传为主体的智慧选择,重点写出百多位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他就难以在53万字的篇幅里完整而且入微地展开上始轩辕下迄汉武的三千年恢宏历史画卷。

如果用绘画来打比方,那么,在他的笔下,既同时拥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的“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也有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的刻划传神各具丰采,还有当风的吴带,出水的曹衣,更有张择端熙熙攘攘市廛之声仿佛可闻的《清明上河图》。《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文采绚烂,令人叹为观止。

写史传的人当学司马迁,能学一点是一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七

列宁说:“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

中国是史学大国。为贤君良将忠臣孝子立传,是中国史学的固有传统。这个传统,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和对国民的灵魂熔铸及精神教化作用,是无可比拟的。先贤典型由是而立,忠奸善恶由是而分,行为规范由是而树,民族精神由是而传。

文天祥临危难作《正气歌》,首先就是列举12位先贤史事,

然后据以慷慨陈辞：“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天祥还有诗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史册。

司马迁的父亲也是史官，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本职工作没能做好，他为此而心存忧惧，临终前“执迁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大受震撼，“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于是有《史记》成。唐张守节评价说：“七十列传，忠臣孝子之诚备矣，笔削冠于史籍，题目足以经邦。”清赵翼评价说：“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研究李大钊家族史，我常常感动于他们道德品质的高尚和精神人格力量的巨大，深感这一精神遗产应当得到彰扬。作为治史的人，惟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客观真实地详加论载，方可称无惧和无愧了。

这是“李大钊家族史研究”项目的第一本书。我真诚期待着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是为序。

宋 霖 2006年10月于合肥

目 录

自序.....	1
---------	---

上 编

关于张学良“劝父不杀李大钊”的若干问题	3
李大钊家族史述论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家庭的百年史	33

下 编

对历史人物不能任意戏说.....	143
李葆华评传.....	149
后记.....	333